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通讯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2022年5月6月合刊·第3期(总第64期)

本期要目

■ 思想前沿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 大系平台

大系出版工程2022年第一次工作协调会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校业务培训会召开

■ 学术视野

坚持民间文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

■ 文化实践

《2021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版发布暨《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十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编写启动会在线召开

目 录

■ 思想前沿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1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座谈会
在京举行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3

■ 大系平台

大系出版工程 2022 年第一次工作协调会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编校业务培训会召开.....4

《大系·说唱卷》编纂工作网络培训成功举办.....6

· 各地推进动态 ·

《大系·神话·河南卷》第一卷、第二卷出版.....7

《大系·说唱·四川卷·彝族克智分卷》改稿会在西昌召开....8

《大系·谜语·江苏卷》编纂工作推进会在苏州举行.....9

· 大系评论 ·

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新地标——记陕北民歌博物馆.....10

何以幻想——写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河南卷（一）》出版
之际.....14

■ 学术视野

坚持民间文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潘鲁生).....16

黄土情民间生 黄河韵高原风——陕北民歌调研随想(王锦强).18

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主体(万建中).....25

主 管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 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

论研究处

主 编

潘鲁生 邱运华

编辑部主任

王锦强

责任编辑

楼一宸

编辑人员

黄晶晶 宋晶晶(实习)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

号院 32 号楼 B305

投稿邮箱

zhongguominxie@163.c

om

电 话

010-59759620

010-59759490

本期印刷: 2022 年 6 月

■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 《2021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版发布暨《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十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 35
- “乡村振兴 民艺赋能——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民艺精品晋京展”隆重开幕..... 37
-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编写启动会在线召开..... 41
- 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46
- 广东云浮举行 2022 年“伍丁诞”民俗文化活动..... 47
- “心手相承——中国蓝印花布长三角巡展”在江苏南通展出..... 48
- 四川省民间文艺精品专题创作培训会于绵阳召开..... 49
- 2022 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讲堂暨“新峰人才”培训班圆满落幕..... 50
- “花儿文化与乡村振兴”全国学术论坛在甘肃岷县召开..... 53

· 国际信息 ·

- 韩国校园迎来潍坊风筝工坊云课堂..... 56
- 端午文化走进布达佩斯校园..... 56

【思想前沿】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习近平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习近平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历史和考古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转自新华社）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座谈会5月23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强烈历史主动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王沪宁表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深刻论述了文艺和人民群众、文艺和革命斗争、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今天我们纪念《讲话》，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艺前进方向，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文艺创作生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要坚持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更好鼓舞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坚持扎根中华文化沃土，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要坚持聚力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推出更多体现国家和民族思想水平、艺术水平、创造能力、综合实力的优秀作品。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团结和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培养造就更多德艺双馨的文艺大家。

黄坤明主持会议，孙春兰、沈跃跃、刘奇葆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文旅部部长胡和平，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文艺家代表陈道明、范迪安、王黎光、仲呈祥先后发言。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和在京作家艺术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转自新华社）

【大系平台】

大系出版工程 2022 年第一次工作协调会暨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校业务培训会召开

6月23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2022年第一次工作协调会暨《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编校业务培训会”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召开。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邱运华，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锦强，中国文联出版社董事长、总经理，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尹兴，中国文联出版社副总编辑、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姚莲瑞，中国民协理论研究处三级调研员、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礼敏，及中国文联出版社《大系》相关编辑、校对、质检等近七十人参会。

协调会由尹兴主持。会上，邱运华从宏观层面介绍大系出版工程的总体进展。2022年是实施大系出版工程的第五个年头，编纂班子、工作机制、编校出版均已进入成熟阶段，分批次陆续完成编纂任务，呈现良好的进展态势。姚莲瑞汇报了《大系》书库出版工作的总体情况，提出《大系》编校出版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经过充分讨论，与会人员协调解决重大选题报备、方言注音及文本的立体采录要素等具体问题。

王锦强主要从大系出版工程的立项过程、工作理念、编纂体例三个方面出发，举例分析编校工作中操刀“疑难杂症”时需要把握的原则、方向和解决办法。首先，编纂工作必须遵守《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要求，这是前提，也是依据。回溯大系出版工程的立项过程，是在中国民协、各地民协和全国民间文艺界几十年田野经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在中宣部严格把关、审慎指导下完成的，《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是《实施方案》的具体化，是开展具体工作的依据。其次，要深刻理解大系出版工程的新认知、新理念、新价值，区别于“三套集成”时期的编纂理念。例如，各卷“概述”风格各异、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个别存在表述偏于感性、过分夸大、用词不严谨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没能深刻理解大系出版工程需要贯彻的新时代人文理念。“概述”应以客观、公正、科学的立场撰写，不带个人色彩和情感，主编团队对地方历史、文化生态要有整体的、历时性的、宏观的把握，需要有积淀、吃透编纂理念，要站在一定高度下功夫写。再次，要严格遵循体例规范，仔细研读编纂细则。举例说明出版编校环节中应如何用好大系出版工程编纂体例规范的“尺子”进行判断，包括作品的真伪辨别，方言、民族语言的语音标注等。

张礼敏指出，大系出版工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实施项目，是记录各地各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动档案，出版社的编辑、校对、质检人员要把《大系》编校工作的认识统一到《工作手册》中来，与专家组、卷本编委会形成三方合力；编校人员要尊重民间文学文本，以学术视角理解民间口头文学文本，不轻易删改。

（中国民协供稿）

《大系·说唱卷》编纂工作网络培训成功举办

6月24日上午，《大系·说唱卷》编纂工作网络培训在“腾讯会议”平台线上举办。本次培训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说唱”编辑专家组组长苑利主讲，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国家一级编剧、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说唱”编辑专家组副组长崔凯同时在线，共同解疑答惑。承担《大系》“民间说唱”编纂工作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协负责人，“民间说唱”编辑专家组部分成员，卷本主编、编委会成员，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校对等百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以《大系·说唱卷》编纂工作为主题，从《大系》的编纂理念和学术要求出发，阐述了“民间说唱”的概念要求、收录作品的范围设定及类别设置，讲解了编纂工作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重点论述和强调了编纂方法及要求。苑利在讲座中指出，确保资料真实，做到“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处理、适当加工”是编纂《大系·说唱卷》的首要要求，在选篇时要注意秉持去伪存真、优中选优以及代表性、全面性、真实性和宽容性原则。他还指出，民间说唱中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私章”，是民间文学地域性、民族性的标志物，具备文化辨识功能，一定要做到符合学术要求的记录和整理；说唱作品的立体记录与演述环境的呈现，对于保存民间文化信息非常重要。

讲座结束后，苑利、崔凯在线回答了各地卷本主编、编委提出的问题。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本次培训对于具体编纂工作有较强指导性，是其他卷本编纂工作可以借鉴和推广的

培训方式。截至6月24日，大系出版工程“民间说唱”卷共启动27卷，其中5卷已出版、1卷正在印制中。

(中国民协供稿)

· 各地推进动态 ·

《大系·神话·河南卷》第一卷、第二卷出版

《大系·神话·河南卷》共分三卷，已出版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收录自“盘古开天”到“三皇五帝”和“大禹治水”的诸神神话；即将出版的第三卷收录了“洪水遗民”“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其他诸神和“文化创造”等神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南大学张振犁教授倡导的对中原民间流传的“活”神话的发掘和研究，使得中原神话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神话体系和较为明晰的“神谱”脉络。中原神话的流传呈现集群式分布的特点，此次《大系·神话·河南卷》就是依照这一特点划分的，所选内容以20世纪80年代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的神话资料和河南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卷”为基础，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编纂成书。

已出版的第一卷收录了“盘古”和“三皇”诸神共457个神话，包括盘古神话、伏羲女娲神话、神农神话与有巢氏、燧人氏神话。盘古神话分为桐柏、泌阳、济源、西华盘古神话群和其他地区的盘古神话；伏羲女娲神话分为淮阳、西华、新密、济源、遂平、汝州、沁阳、孟津巩义、荥阳、淇县伏羲女娲神话群和其他地区伏羲女娲神话；神农神话分为淮阳、沁阳、济源神农神话群和其他地区神农神话。

已出版的第二卷收录了“五帝”和“大禹”诸神共430篇神话，包括黄帝神话、嫫祖神话、仓颉神话、岐伯与祝融神话、颛顼与帝喾神话、尧与舜神话、大禹神话。黄帝神话包括新郑、新密、灵宝、济源、汝州黄帝神话群和其他地区黄帝神话；嫫祖神话包括新郑、荥阳、西平嫫祖神话群和其它地区嫫祖神话；仓颉神话包括南乐仓颉神话群和其它地区仓颉神话；岐伯与祝融神话包括新密岐伯神话群和新密祝融神话群；颛顼与帝喾神话包括内

黄、商丘颛顼与帝喾神话群和其他地区颛顼与帝喾神话；尧与舜神话包括范县、登封、济源舜神话群和其他地区尧舜神话；大禹神话包括三门峡、济源、登封、禹州、桐柏大禹神话群和其他地区大禹神话。

中原神话之所以长久流传并为世人瞩目，其原因就是这些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口头文学”至今仍“活”在人们的口头上。每一集群神话都与地方风物紧密关联，这些神话人物进入百姓生活，成为人民的语言民俗和行为民俗，这也许就是中原神话的魅力所在。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原地区发现的若干古典神话的延续，推翻了过去中国神话贫乏、仅有断简残篇的片面结论，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和世界神话学。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大量有关开天辟地、宇宙创造的神话材料的发现，填补了这类神话材料的空白，纠正了史学家们关于中国神话中仅有圣贤英雄人物的史迹材料的传统观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卷主编程健君持续进行中原神话的田野考察与研究，作为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主要成员，发表多篇《中原神话调查报告》，参与完成了“古代东方文化的曙光——中原神话文化价值论析”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著作《民间神话》获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等奖项；主编（合著）《中原神话专题资料》《神话与民俗》《神话 神话》《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等著作。

（转自微信公众号“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大系·说唱·四川卷·彝族克智分卷》 改稿会在西昌召开

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和传播，《大系·说唱·四川卷·彝族克智分卷》编纂工作组于5月25日下午在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召开改稿会议。凉山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吉则利布（凉山州文联编审），西昌学院何刚教授、孙正华教授、阿牛木支教授等编写人员参会，会议由分卷主编何刚教授主持。

会上，编写人员充分讨论了专家提出的审稿意见，明确了修改思路和任务分工，统一

了“导言”和“附记”等的撰写方式和内容要求，并对改稿时间进度作出安排，确保编纂工作顺利完成。

针对审稿专家提出的缺少民间文学传承场景、重要文本、田野过程的照片等材料的问题，编写组充分整理了文本，制定了下一步田野工作的开展计划。

（四川省凉山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供稿）

《大系·谜语·江苏卷》编纂工作推进会在苏州举行

6月25日，《大系·谜语·江苏卷》编纂工作推进会在苏州古镇角直举行。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唐华伟、驻会干部李林青，中国民协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卢志文，江苏省民协灯谜学术委员会主任武骝，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怀念、副主席兼秘书长吴越晨，以及江苏各地具体负责《大系·谜语·江苏卷》采集工作的同志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强调，要对前期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全面校对，重视条目背景资料的补充；民间谜语的采集须站位江苏、充分挖掘，全面搜集五四以来在江苏地域流传的民间谜语，按照体例要求应收尽收；重视采风调研，认真梳理谜语的发展脉络，把当代流传的谜语囊括进来，使其更富有贴近劳动人民生活的时代气息。江苏是文化大省，域内文化多样，如“吴文化”“金陵文化”“淮扬文化”“徐淮文化”（或称“楚汉文化”）以及“海洋文化”，各地在采集过程中应充分重视文化特征鲜明的谜语。

在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指导与各地采集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大系·谜语·江苏卷》谜语汇总工作卷已初步形成。与会人员在充分肯定前一阶段工作成绩的同时，围绕采集编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畅所欲言，积极讨论寻求解决方案。

会议还对下一步的采集编纂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地民协加强对《大系·谜语·江苏卷》采集编纂工作的指导，协调多方资源，推进谜语采集工作。

（转自微信公众号“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 大系评论 ·

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新地标——记陕北民歌博物馆

卞正兰¹

2021年4月16日至20日，我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陕北民歌”民间传习状况调研。其间，陕北民歌博物馆是调研行程中的重要一站。

4月17日，我们来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的陕北民歌博物馆参观。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民歌音乐博物馆，作为国内唯一一座以陕北文化为元素、以陕北民间音乐为主体、反映陕北悠久的历史变迁、体现陕北历史人文精神，集民歌研究创作、培训交流、演艺推广、产品研发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它的建成开放，填补了国内空白，既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汲取前进力量的精神宝库，同时也是榆林建设陕甘宁蒙晋交界处最具影响力城市对外宣传的文化名片。

陕北民歌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1800平方米，其中布展面积约5680平方米。总体布局为序厅、第一篇章“千年老根黄土里埋”传统陕北民歌展区、第二篇章“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革命历史陕北民歌展区、第三篇章“满天星星一颗颗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陕北民歌展区、第四篇章“信天游永世唱不完”新时期陕北民歌展区、第五篇章“陕北民间音乐艺术专题展区”、第六篇章“陕北民歌研究专题展区”、尾厅及临时展区共八大板块，以陕北民歌的发展脉络为主线，“纵”向反映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横”向反映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全面展示了陕北民歌的前世与今生。

一座“会唱歌”的博物馆

与以往参观过的博物馆相比，陕北民歌博物馆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他绝大多数博物馆主要靠“看”或靠“讲”，而这里最具特色也最吸引人的展现手段是“唱”。

¹ 卞正兰，中国文联出版社高级编辑、副编审。

“千年老根黄土里埋”是陕北民歌博物馆的第一篇章展区名称，也是陕北民歌历经沧桑、深深扎根黄土地的真实写照。从这一篇章开始，观众就可以聆听到现场演唱的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等各类陕北民歌。有的讲解员也身兼歌手，讲着讲着，便声情并茂地歌唱起来；有的歌手是专业院校毕业生，字正腔圆，拿捏到位；还有通过民间报名、筛选录取的信天游歌手，一开嗓，高亢嘹亮、粗犷奔放的陕北民歌响彻整个展厅。在观看陈列内容的同时，会不时遇到博物馆从当地招募的民间艺人现场表演经典民歌。博物馆内配备的多媒体视听设备可供游客随意点播，有兴趣的观众还可以按照展出的一首首曲谱现场“来一曲”。秧歌展区展示出的几十种陕北秧歌场面图景，也是一大亮点，观众可以参与到现场的秧歌队伍中，踩着秧歌步，配着歌手的现场演唱，博物馆瞬间变成热闹非凡的体验演出舞台。

陕北民歌博物馆的参观过程相当于一次对陕北民歌的巡礼，走在博物馆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深刻感受到陕北民歌的独特魅力，除了《黄河船夫曲》《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蓝花花》等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民歌外，我们还欣赏到了榆林小曲《张生戏莺莺》，无论是铿锵有力、节奏整齐的劳动号子，还是不受束缚、题材丰富的生活小调，以及那大胆质朴又苍凉婉转的爱情歌曲，都让人驻足聆听、流连观赏。这座“会唱歌”的博物馆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

“鲁艺”精神的传播园地

陕北民歌博物馆选定在 2018 年 5 月 23 日这个日子隆重开馆，颇有历史纪念意义，这一天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6 周年。

对革命时期陕北民歌的介绍和展示，正是博物馆的核心内容。自古以来，陕北民歌都是口耳相传。真正把陕北民歌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形态来收集、整理和研究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这个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在陕北民歌博物馆，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时期是陕北民歌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即“鲁艺”时期。

1938 年 4 月 10 日，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在延安举行建院典礼，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亲临现场祝贺。学院设音乐、美术、戏剧三系，后增加文学系。4 月 19 日，毛泽东在为全院师生讲话中说：“民歌中确实有许多好的东西”。自此，音乐系师生走出

校门，以“到民间去”的精神为指南，面对面地记录民歌和各种民俗音乐。这样的采录方法，是前所未见的。两年以后，毛泽东再次发出号召，要求文艺工作者从“小鲁艺”走进“大鲁艺”，陕甘宁民歌的收集整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持续的时期。鲁艺师生不仅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掀开了新的一页，也为此后数十年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为陕北民歌博物馆题写馆名的著名诗人贺敬之，当年是鲁艺的一员。1943年，贺敬之从鲁艺文学系毕业，正式加入鲁艺秧歌队的创作队伍。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革命历史陕北民歌展区中，立有贺敬之的雕像，那是在鲁艺时期的贺敬之，刚满二十岁，意气奋发的形象。贺敬之三部最重要的作品《白毛女》《南泥湾》《回延安》，在中国家喻户晓，长演不衰。红色歌剧《白毛女》最初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上演，在展厅中，也有复原场景的展现。在那个年代，《白毛女》以它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千千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劳动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它不但在当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激情的艺术魅力感染大众，持续至今。

鲁艺的音乐家、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体，在陕北各地大规模、有组织地采集民歌，开辟了陕北民歌由口头传唱到纸质出版的新纪元，为陕北民歌的传承和保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陕北民歌”的概念是在这一时期（1939年）正式提出的，第一部关于陕北民歌的著作《陕北民歌集》（1939年由民歌研究会整理编纂）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后，创立会刊，发表陕北民歌收集整理成果。文学系成立文艺运动资料室，对鲁艺师生在陕北搜集到的民间文学材料加以整理，在1946年9月编定文学版《陕北民歌选》，并于1947年8月由晋察冀新华书店铅印出版，这是陕北民歌迄今为止能见诸于纸面记录的第一本权威集子，在陕北民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延安鲁艺民歌采集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和成果是以冼星海为首的20世纪中国最优秀音乐家借助陕北民歌和陕北民间音乐元素，挖掘、改编、新创出《东方红》《黄河大合唱》《七月里在边区》《拥军花鼓》《生产大合唱》等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歌曲，极大地推动了陕北民歌在陕甘宁边区的广泛传播，直至今日，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鲁艺精神代表了艺术为人民的方向，其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如今，鲁艺精神是文艺扎

根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陕北民歌博物馆无疑是学习、传播鲁艺精神的绝佳园地。

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新地标

陕北民歌的蕴藏十分丰富，自 1938 年被来自全国的延安鲁艺音乐家们发现以来，八十多年间的记录、整理活动从未停止。不同时期记录下来的民歌数量，从几十首到几百首、从几百首到几千首乃至盈万。即便如此，新的陕北民歌仍然随时都会从歌手们的口中飘然而出，日积月累，铸成一座承载并珍藏于陕北人文化记忆的丰碑。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陕北民歌的“大美”，在充满诗情的唱词中，在直浸人心的音调里，它大胆而质朴、浓郁而深沉，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陕北民歌经历了传统民歌、革命历史民歌和新传统民歌的不同时期，每个时期都留下了经典之作，每一首经典都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历史叙事，值得后人再挖掘、再品味、再深思。这一首首的经典曲目就是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在参观即将结束时，路过博物馆的资料室，透过玻璃窗，我注意到里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把一本本历史资料录入博物馆的数据库中，以便于参观者使用数据信息查询系统，查询陕北民歌的视听、图像、文字资料。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完善，博物馆正以创新的理念，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方式，以更多元的形式和更丰富的内容，展示陕北民歌、陕北文化的独特魅力。疫情期间，陕北民歌博物馆还推出了线上参观 360 度 VR 全景虚拟展馆服务，将博物馆数字化资源与 VR 虚拟技术相结合，此外，还打造了网络直播，实现了“云游博物馆”，全方位、活态化展示陕北民歌文化，让观众在云端获得身临其境的游览体验。

博物馆作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宝库，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是对往昔高光时刻的回眸与挽留，是一种守望与坚持。陕北民歌博物馆以经典陕北民歌诉说黄土高原社会、历史、艺术、民俗发展，以实物展品陈列配合现代展示手法，尽可能将陕北民歌粗犷、明快的形式美与苍凉、悲壮的内涵美融合，它是一部活的陕北民歌史教科书，拥有让陕北民歌乃至中国民歌、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活起来的力量。这座博物馆已成为陕北人的精神家园，并成为中国音乐类博物馆的标杆和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新地标。

（中国民协供稿）

何以幻想——写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河南卷（一）》出版之际

刘丰¹

提到神话，有的人或许会想到多年前成龙的同名电影《神话》，不过这里的“神话”不仅年代更加久远，它涉及的话语背景和探索范围更不尽相同。

民间文学视域下的神话，反映的是原始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钟敬文先生认为：“神话是民间文学中最富于幻想的形式，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神话通过神奇的幻想来表现生活。”的确，神话的“天地观”便充满了奇幻的想象：“很早很早以前，早在天地没分的时候，天上有个叫盘古的大神，披着驾云衣，穿着登云鞋，走出南天门，在云彩里游玩。游来游去，面前飘来个大气包，大气包飘来飘去，挡住了盘古，他没法往前游玩了。一气，用常带在身边的斧子把气包砍开。”这便是盘古开天的基本经过，真切反映了人类童年时期对天地、对世界来源的认识水平和表达能力。

天地初开，没有人类，怎么办？盘古爷整天想着造人的事儿，受黄泥巴的启发，开始了捏泥人造人。原始社会，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盘古爷请日月、行私雨、造水牛。“盘古爷死后，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两只胳膊和腿变成了四极五岳山脉，血液变成江河，汗毛和头发变成树木花草，骨头变成了金子，肌肉变成了田土，汗流变成了雨水。他的脊梁骨靠在大石头上，变成了巍巍的昆仑山，黄河水从昆仑山下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从盘古开天可以看出，原始时期的神话不仅代表了人类童年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还产生了强烈的幻想效果。这种幻想不是无本之末、无水之源，它始终从人们自身的劳动和生活出发，不仅赋予认识对象以“生动奇妙的形象，而且自然而然地倾注了人们的愿望和爱憎”。的确，盘古爷不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开天大神，他还走向人间、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他生前的行为和死后的躯体均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与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

¹ 刘丰，《大系·神话·河南卷》责任编辑。

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是人类的创造之神和保护之神。

还有，“女娲补天”神话把原始人遇到的灾难和女娲补天的过程进行了极度的放大和夸张。女娲不仅熔炼五色石为石浆，灌进天塌后的窟窿，而且放火烧天，把天昏地暗的天熏成了现在的蓝颜色；不仅打断巨鳌的四足，重新撑起原来塌下的天空，而且杀死黑龙等野兽，填塞沟壑，整治了地上的灾难。集智慧与勇气、头脑与力量于一身的女娲，不仅完美体现了原始人征服自然的强烈而宏大的愿望，而且用神话——这一幻想的集大成者——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女性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本卷的责任编辑，如果说工作中最深刻的回忆，我想应该是河南神话作为中原神话的核心，它所代表的丰富内涵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大量的地名、山名、河流名等文字给我这个“地理小白”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不过我也有“神”助，那就是主编程健君老师。大量的注释，彰显了程老师的学术水平和职业素养，更增加了本卷得以出版的维度和价值。每篇神话不管是最后的附记，还是最下的脚注，它们都架通了一座桥梁，一座把古代神话与现代风物紧密黏连的桥梁，一座使语言民俗、信仰民俗和行为民俗互联互通的桥梁。

伏羲女娲神话是神话在原始社会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传广泛而集群突出。主要脉络之一是：天塌地陷后，这世上就剩下女娲、伏羲姐弟俩了，为了繁衍后代，姐弟成婚成为主要话题，滚磨成亲又成为该话题下的主要内容。比如，新密市开阳山磨合沟就“附会”出了磨石和当年放磨盘的磨眼，还有开阳庙的祭祖活动；遂平县嵯峨山的红石崖也“见证”了滚磨的全过程，并以“天磨峰”为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遂平县是“中国女娲文化之乡”“中国女娲文化研究基地”，这与该地有着丰厚的女娲文化“活态”资源密不可分。

由此一窥，神话的历史价值昭然若揭，它拉近了现代人与远古人的距离：不仅凭借文字记录，更难得于口口相传；不仅有具体的风物佐证，更遗存了丰富的民俗活动。“神话中积极向上的愿望、热烈奔放的感情、神奇瑰丽的想象”不仅存在于大量古典神话本身，更在于长久、持续、深刻地与各地的民俗文化和生活交融共生。

由此，也派生出了神话的重要美学价值：“通过幻想表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手法被普遍采用，历久不衰，形成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神话的现实意义在于其具有的幻想精神。还记得鲁迅小说《补天》吗？它便是以“女娲补天”神话为故事原型，用“幻

想”呼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性格、中国道路的自觉和探索吧。

今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大数据、AI 等人工智能彻底改变了神话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但我们仍未觉得它过时，相反，神话所固有的幻想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如果用文章开头的电影《神话》来说明，这部近 20 年前的大荧幕作品一改科幻剧穿越未来的窠臼，反向延续穿越古代的幻想尝试，让我们身处历史延续、文化承传之中，慨叹科技对其呈现、传播的能量之余，也找到了情感共鸣、历史认同和文化归宿。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是新时代推动文化建设的思想指引和工作方法，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便是“幻想精神”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幻想精神”是文化的传承发展、交流互鉴、繁荣兴盛的必由之路，而“中原神话，是一块难得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这句本卷“概述”结束语，似提示我们：幻想作为神话在今天的使者，滋养并推动着我们不断思索和感受生活和命运、歧义性和共同体、信念、意志和融合的未来……

（中国民协供稿）

【学术视野】

坚持民间文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

潘鲁生¹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关键阶段，对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的根本问题做出剖析和阐释，明确提出文艺工作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要围绕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去进行文艺创作，深入分析和阐释了党的文艺与相关工作的关系以及文艺的评价标准，不仅对当时的文艺界整风运动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

¹ 潘鲁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

革命文艺成为支持抗战的精神食粮，而且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基本走向。

在民间文艺方面，《讲话》关于人民生活作为文学艺术之“唯一源泉”的阐释，对于民歌、民间故事等“萌芽状态的文艺”所怀以情感的分析，对于“到群众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以及“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的方法分析，也是对民间文艺的生活基础、人民主体、重要意义以及创作与研究方法的阐释和部署，具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价值。正如1942年《讲话》发表后，鲁艺师生等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许多文艺家参加到根据地的抗敌斗争和生产劳动中，积极以民间文艺形式反映时代生活，大力发挥文艺鼓舞宣传、团结凝聚的实际作用。民歌、评书创作掀起热潮，运用人民群众熟悉的地方语言和曲调，宣传革命政策和精神，发挥了精神鼓舞的积极作用。延安的秧歌戏、秧歌剧反映拥军参军、开荒生产等时事主题，由工农兵群众共同参与创作演出，促进了团结与凝聚。还有延安的新剪纸、新年画、新皮影等，以民间艺术语言表现革命生产生活，得到群众认可和喜爱。可以说，中国现代文艺由此进一步实现了艺术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民间文艺融入并服务于民族解放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重温《讲话》精神，再次深刻体会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文艺的时代性——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火硝烟中，文艺就是要“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发挥支持抗战、凝聚人心、团结力量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文艺路线从目标到方法贯通为一的“人民性”内涵——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从最根本的立场上、情感上以及深入生活去调查和寻找创作方向的方法上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从而真正满足人民的需求，服务人民的发展，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我们的民间文艺事业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宗旨和方法，在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中、在不断传承和发展中实现意义与价值。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救亡图存的历史时刻走进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国家的建设任务、社会的发展主题与时俱进，民间文艺也有时代命题和社会使命。正如八

十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指导文艺实践，民间文艺在革命事业发展中发挥了团结群众、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积极作用，今天，在新的时代征程中，我们要进一步扎根时代生活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包括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加强对优秀民间文艺传统的传承传播，发掘弘扬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与独特的精神标识，不断凝练民族复兴发展的文化精神力量；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中，充分发挥民间文艺维系乡愁记忆和助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文化创富的深层作用；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中，使民间文艺发挥赋能产业发展的“文化 IP”作用，形成民间工艺、民间美术等与旅游、文创乃至工业设计制造联动作用和叠加效应；在文化建设、教育民生等发展中，使民间文艺作为节日的欢歌、乡土的图景、民族的史诗、孩子们的歌谣等等多姿多彩的存在，增添生活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做到传承生活文脉，服务人民群众，努力践行民间文艺的社会使命。

八十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吹响了文艺顺应时代需求、服务人民群众的号角，指引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认识艺术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回顾重温，不断学习，我们要深刻理解艺术发展的目标和方法，在时代发展中坚守人民立场，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培根铸魂，用心用情用力“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中国民协供稿）

黄土情民间生 黄河韵高原风 ——陕北民歌调研随想

王锦强¹

2021年4月16日至20日，“‘陕北民歌’民间传习状况调研”活动在榆林展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歌谣”专家组成员，陕西省资深民间文

¹ 王锦强，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艺工作者、榆林市民歌专家及其他方面民间音乐人组成的专家团队深入榆阳区、横山区、绥德县、佳县等地多个街道社区、乡镇村落，通过实地观摩、现场采访、专家评介、对话访谈、查阅资料、座谈研讨等形式，就陕北民歌的概念与类别、分布与流传、采集与记录、范式与研习、人才与“两新”、传播与利用、现状与朝向等课题汇集了阶段性思辨成果，并尝试为《大系·歌谣·陕西卷·陕北分卷》的编纂工作提供鲜活田野理论依据和学术支持。

导入与体认

世代生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儿女，孕育和传承了鲜明民族文化特征和浓郁地域民间风格的人文精神与文明传统。深厚农耕文化在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中定盘并与戈壁风沙浅草滩上驼铃伴月马蹄踏月中交织出西北风的朝向。作为这方土地珍贵文化物种及代表性民间艺术样式的陕北民歌绵延赓续蔚为大观，在悠长的游牧文化濡染中信马由缰春风得意。陕北民歌高飙于边关塞漠，璀璨于黄河故道。延安和榆林两地是陕北文化的核心区域。

据说世界有三大民歌：陕北民歌、蒙古族民歌、俄罗斯民歌。陕北民歌是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的精神与灵魂。陕北民歌拥有一个庞大的民俗文化家族和民间音乐体系。其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常见的代表性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劳动歌、船工号子、民间小调、酒曲、秧歌、陕北说书、道情、二人台等。其中，陕北说书、道情、二人台等是传统的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范畴，属于地方曲种戏种，但因其与民歌为一应的方言土语，伴随了民间音乐的植入、渗透和溶解，富有民歌演唱特点和方言美感。陕北人杰地灵，自古就有“文出两川，武出三边”之说（“两川”指延川、宜川，“三边”指定边、靖边、安边）。陕北说书最初是由穷苦盲艺人运用当地民歌小调演唱传说故事，后来吸收道情和信天游等曲调以丰富说书唱曲表演，取悦各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并逐步开宗立派，扬名立万。伞头秧歌更是比唱的角逐，伞头临场演绎、出口成章的才艺和本领，在天文、地理、历史、时事、村情、风俗、农事活动、家长里短等文化叙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神采飞扬。自编自唱、即兴发挥是民歌及说唱艺术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民间艺术创造性表现的至上境界和卓越追求。并且，民间歌手与民间说书人常来常往、推杯换盏，彼此多有交集和兼修，故均以陕北民歌综而述之。

陕北民歌流行于陕北全区域，滋养于社会各阶层，弥漫于生活全链条，辐射于周边多

省区。位于黄河中上游的晋陕蒙地域相邻、文化相亲、血脉相连。甘肃、宁夏等与其交界处的地方歌种均为陕北民歌的远亲或近邻。在榆林、延安的城镇街头巷尾、市集店铺，乡村窑洞院落、田间地头，商旅关隘驿站、水陆码头，歌声八面来风、钻心灌耳，酒酣胸张、荡气回肠。行船赶脚揽工汉、耕田锄地羊出坡、晒谷扬场打连枷、碾米磨面炸油糕、做茶打饭卖饼子、喝酒吃肉打平伙、婚丧嫁娶办事情、满月百天祝寿辰、缝补拆洗纳鞋底、拉锯擀毡搓麻绳、上梁暖窑迁新居、节庆秧歌转九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陕北全域文化表情及全套生活密码都蕴藉于民歌当中。民歌叙事在陕北文化版块中有着经天纬地般的非凡价值和光环。它是民众抒情抒怀万般“神器”，民间学礼学艺学史启蒙教材。

代际与薪传

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高峰的是那些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的优秀民间艺人和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他们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一方风物学理与社会生活结构单元的阐释者，也是民间文艺薪火相传的关键因素。在现当代陕北民间艺术领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民歌手和说书艺人，如农民歌手李有源、黄河船工李思命，陕北书匠韩起祥、张俊功等一代宗师。贺玉堂、柴跟、王向荣、朱广亮等是新世纪的领军人物。熊竹英、孙占东、雒胜军、王二妮、杜朋朋等是新时代的佼佼者。丁文军、贰强借视频网传民歌走红，二人还搭档登上虎年央视春晚舞台。

“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君子有成人之美”。黄天厚土，护佑苍生。我们的祖先悲天悯人，在开天辟地中不断创造和优化海阔天空的人才成长空间，也给包括盲人在内的各色人等预留了闪光的经世致用“公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奉献无穷经验与丰富阅历。善待弱势群体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神授天职”的盲艺人惊世骇俗，不辱使命。盲艺人是宿命观和危机感最为强烈的群体，他们用心最诚、用功最勤、应变最敏，他们博闻强记、“口吐莲花”，他们在“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中成就自我，塑造了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优秀品格。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健康也得到根本性保障，盲艺人群体一家独大的陕北说书随之翻开了历史新篇。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越来越多耳聪目明能言善辩的青年才俊加入了说唱艺术行列，甚至有不少天资聪颖心灵手巧的女娃娃也爱上了说书。明眼说书人不仅能够耳听八

方，更善于眼观六路。民间文艺需要熔古铸今、超越局限，并不断提升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晋陕蒙“鸡鸣三省”之地的准格尔旗民间歌王齐附林与河曲顶级歌手辛礼生、吕桂英、韩运德以及临县伞头贺升亮等演唱的漫瀚调、山曲、二人台、秧歌等在这一带也很有名气。王向荣、齐附林等于2007年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荣誉称号。雒胜军、熊竹英还分别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

2012年5月，由中国民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等单位举办的“晋陕蒙优秀秧歌伞头选拔赛系列活动”云集了吕梁、忻州、榆林、延安、包头、鄂尔多斯等“三省六市”众多歌手汇聚榆林展开紧张而激烈的嘴上功夫比拼和角逐。天下功夫，唯快不破。吃开口饭的民间歌手、说唱艺人，一出场便妙语连珠，技惊四座。选拔赛要求秧歌伞头现场抽题、即兴编唱，以考验他们的临场应变能力、快速应答能力、扎实演唱功底和高超语言技巧。临县的赵江、刘林利，延川的张荣，子洲的赵利书，横山的张秉生、曹振鹏，清涧的曹宏信，绥德的郝向元，佳县的刘庆仁，吴堡的李探春，鄂尔多斯的陈志业等一众歌手，表现抢眼，脱颖而出，并于其所在区域产生秧歌“头雁”效应。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横山下来些游击队》为代表的横山民歌传唱大江南北，优秀歌手艺人层出不穷。横山人韩起祥能说唱几十部书几十种民歌小调，他被毛主席称为“三弦战士”，因而在陕甘宁边区声名显赫。出生于横山区柴兴梁村、活跃于延安地区的张俊功1979年为电影《北斗》说书配音后使一夜成名。延安市甘泉县在桥镇乡建立了张俊功纪念馆并开设说书传习所，由张氏传人、陕北说书名师樊九平收徒传艺。

横山民歌群众基础深厚，传承谱系清晰。近年来，横山区委、区政府积极推动民歌进村落、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积极培育传承人群，保持良好存续状态。2019年5月，中国民协命名横山区为“中国陕北民歌之乡”。

横山说书与民歌的渊源颇深，横山民歌中诸多曲风均来自于说书，说书唱词中又加入大量民歌、道情曲调。孙占东、熊竹英、李光明、卜晓刚等在党岔镇韩起祥纪念馆、区文化馆说唱的《思念韩起祥》《刮大风》等曲目充满乡土气息和民间韵味。由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民协、山东省文联于2019年4月20日在山东省潍坊

市寒亭区举办的“2019中国北方民间说唱交流大会”上，孙占东等五人表演的陕北说书《咱是说书唱曲的人》让台下受众赞不绝口。吴芝良、赵海亮等横山籍青年歌手在榆阳区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驻地演唱的《走三边》等民歌融入了新时代新生活的感知与感悟。

在众多酒摊场中，横山酒曲唱词的套曲大量现编现唱，有的通宵比唱，脱口而出，对答如流，在乡间庄户人家群落经久不衰。歌手曹振鹏演唱的《横山传统酒曲》《丈母娘看见女婿笑嘻嘻》《推炒面》，李德堂的《拦羊的哥哥》《老天爷心疼咱受苦人》等曲目，唱词精彩，曲调娴熟，声音高亢悦耳。王勇、鲁炳国、王海忠、刘月玲等歌手唱功炉火纯青。令人扼腕和痛惜的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民歌手李强春，在这次交流演唱活动后不久，出坡放羊时不幸辞世。与他日日相伴的羊群熟门熟路斜阳西沉入栏，他留下的《送大哥》《花花小拳》等酒曲依然在山间与蓝天白云一起缭绕。

动态与朝向

并非陕北出生的民歌发烧友演唱的有本土音乐特征而且带陕北口音的歌曲都可以称为陕北民歌，文人创作和改编的歌曲亦不在此列。吃百家之饭，集众艺之长。曾几何时，民间说唱艺人和民歌手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住到哪儿、学到哪儿，见什么说什么，问什么答什么，想什么唱什么，生活中的千头万绪、千丝万缕皆可入歌入曲入书。这是风俗，也是生活法则，更是民间艺术传统。由于大众传播与近年来学术研究等原因，信天游近乎成了陕北民歌的代名词。信天游的名称在民间并非众口一词，“三边”一带称“顺天游”，神木、府谷及邻近的内蒙古地区又名“爬山调”，山西河曲等地则为“山曲”。信天游是晋陕蒙黄河流域民众人生体验的表白、情感意志的表露、生活向往的表达。它所使用的比兴手法，完美地契合了这种文化与传统的内在逻辑。因此，触景生情，借景抒情，以物喻人，因事及人，即兴编唱，随意赋词。比由生活而起，兴由激情所致。

生活是陕北民歌的源泉活水，没有陕北生活的日积月累和酸甜苦辣的深切体会，没有地方历史经验与传统的厚积沉淀、感同身受，没有当代人文精神的启迪和时代理念的贯穿和融通，要在民歌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找到勇毅的力量和坚定的朝向，是难以想象的。

李思命唱响的《天下黄河几十道湾》、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成为中国民歌的世

纪经典。在黄河水里泡大、祖祖辈辈在这里摸爬滚打的生活经历以及刻骨铭心的船工记忆，才能让人唱出如此前无古人的气壮山河之歌。在李思命的家乡佳县荷叶坪，人人会唱这首黄河船夫曲。村民们还在村头立了一块巨大的“天下黄河几十道湾”石刻，为本土文化创造书写历史与记忆。李家后人传唱的船夫曲激越了黄河涛声的壮阔与澎湃。水船曲、船工号子、打夯歌等民歌仍然此起彼伏，风华迭代。

81岁的郭来香是黄河对岸山西临县人，嫁到荷叶坪村后不仅带来了娘家的女工手艺，还把从小学会的《走太原》《奴女》《掐蒜苔》等传统民歌教给大家学唱。“山西省的（个）临县人，我是寨沟村生。我的（那个）名字叫郭来香，今年81岁的人。”郭来香唱民歌自报家门，现身说法。据民歌研究专家申飞雪回忆，40多年前采录过郭来香的歌。时至今日，韵味犹存。从她身上，可以感悟些许秦晋之好的民间文化遗韵，领略民歌艺术的你来我往，一衣带水。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享誉海内外的旷世之作不仅对全国人民有着异乎寻常的成长记忆和心路朝向的博大情怀，在李有源家乡更加风清日朗、耐人寻味。

李有源的孙子、孙女李要爱、李锦连在上小学时写过一篇作文，发表于1977年2月号的《陕西少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东方红，太阳升。”1935年，毛主席率领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陕北高原升起了不落的红太阳。从此，陕北人民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过上了当家作主人的幸福日子。从严冬过来的人，最知太阳的温暖，受尽剥削和压迫的穷苦人，最感毛主席亲。这时，他们眼望北斗星，心怀延安城，有多少知心话儿要对毛主席讲，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毛主席唱啊！我爷爷就是抱着感谢共产党、热爱领袖毛主席的感情，来编唱《东方红》这支歌的……我爷爷唱了一辈子《东方红》，直到临终前，还对我爸爸说：“孩子，不要忘记毛主席是咱们穷人的大救星，《东方红》这支歌，我们要一代一代唱下去，让子孙万代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恩情。”爷爷生前曾一句一句教给爸爸唱，爸爸又一句一句教给我们唱，我们全家都学会了唱《东方红》，都爱唱《东方红》……每当我们全家唱起《东方红》这支歌，就好像来到毛主席身边，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浑

身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农民歌手李有源 1942 年创编的伟大颂歌《东方红》，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凝结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朴素情感。1949 年 10 月 1 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伟大时刻，奏响的背景音乐就是《东方红》。1957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东方红》。《东方红》唱响中国大地。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东方红》作为“历史的最强音”被当作中国送上太空的第一首乐曲，响彻寰宇……

在佳县佳芦镇张家庄村李有源故居，李有源的重孙李刘伟自豪地讲述了他们一家四代传唱《东方红》的故事。李有源的儿子李增堂、李增光，侄儿李增正、李增成都是民歌高手和村秧歌队的牵头。1944 年春天，李增正还带领移民队把《东方红》一路唱到了延安。李有源侄儿、95 岁高龄的李增成仍然生活在张家庄村。2021 年 4 月 20 日上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李增成坐在李有源故居院里的石碾前，高声唱起了《东方红》。虽饱经沧桑，但他的声音依如东升旭日、光芒四射，深深打动和感染了众多访客。其孙辈李锦鹏、李田田等悉心保护祖居窑院，并配合有关机构广泛搜集历史资料和图片，不断充实故居文化档案，接续颂歌记忆链条，热心为世人提供讲解和咨询服务，以践行民间文艺人民创造、人民传承、人民享有、人民表达、人民阐释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与民间文化生态理念。2008 年，毛泽东诞辰 115 周年前夕，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高智，西安画家刘文西、摄影家申忠雄等向李有源故居捐赠了他们的作品及珍贵历史照片。为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佳县筹建了东方红纪念馆、东方红大剧院、东方红文化产业园等教育基地和传承基地。2021 年，佳县还举办了陕北民歌比赛、东方红歌会等文艺活动，积极推进民族历史文化与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真正融合、全面融合、深度融合。

1952 年，李有源参加了陕西省文艺创作者代表大会。申飞雪 1977 年采录的一首李有源编创、李增正演唱的秧歌《人民的江山万万岁》：（独）人民（哪）高，人民（哪）贵，人民（哪）参加了文代会。人民的意见（是）最宝贵，人民的江山（是）万万岁，（齐）（嗨么哟嗨）人民的江山（是）万万岁。

人们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人民歌手”李有源的人民立场和创作实践，对当今的文艺工作者仍然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转自文艺报 APP）

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主体

万建中¹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已在许多学校蓬勃开展，但依照现在的建设套路，完全受制于学者们的话语霸权，必然导致传承人作为非遗主体的话语权缺失。如何保障非遗学科建设凸显其本体属性并达到预期目标，推动传承人进入非遗学科体制内部并成为建设的主体至关重要。这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决定的，传承人所秉承的非遗经验、常识、记忆和行为技能等构成非遗学的知识体系，这才是非遗得以生存的根基。民俗学学科建设中完全排除“民”的话语权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学科发展较迟缓的境况。有鉴于此，非遗学科建设应当突破僵硬的发展模式，还原并直面非遗的生活形态，以非遗实践作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给予非遗传承人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的话语权。非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并非取决于传承人的“传承”，而在于传承人形象的塑造及其“学者”身份的赋予。实践至上是非遗学科的根本性特征，传承人的实践方式、行为和经历必须转化为非遗学科的内部知识和理论话语，还给传承人应有的参与制订人才培养计划、讲授非遗课程的主导地位，才能创建一种切合非遗实践的、与民俗学等学科不同的崭新的学科建设范式。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传承人；主体；权力；知识

2021年2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1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同意有关学位授予单位开展非遗方向和二级学科人才培

¹ 万建中，中国民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养试点，可以“结合自身学科专业优势，在相关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下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有条件的单位也可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二级学科，培养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认定、传承保护、现代化及转化方面的高层次专业化人才”。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在一些高校陆续展开。不同于其他学科，其建设之重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建构，而在于保护实践的运作。“保护”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确立并形成一种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地方文化精英工作在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线，毋庸置疑，拥有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权。以往，他们是学术的他者，是被访谈的对象，而进入非遗学科建设的语境中，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主体。他们既是当地非遗的传承者、言说者，又是研究者和教授者。作为科班出身的“我们”，只能是研究者，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传承者。非遗学科建设，不仅仅是非遗学科获得承认并进入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还要确立非遗传承人“学者”的身份，给予传承人正当的话语权，赋予传承人在学科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一、民俗学之于非遗学科建设的参照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所依托的主要专业是民俗学。而民俗学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并不健全，甚至可以说学科的发展比较迟缓。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一直以来陷入了一种误区。那就是把“Folklore（民俗）”定义为“民众的知识”，“在过去，一般认为，所谓的‘俗’，简单说就是知识和学问。‘民俗’就是普通百姓的知识和学问”。劳里·航柯（Lauri Honko）也认为：“它（民俗）是被传统所包裹的民众‘知识’；是被看不见的文化（Invisible Culture）所包裹的民众的‘知识’。”一直以来，民俗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使民俗摆脱生活状态，上升至学问、知识和认识论的层次。原本属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民俗发生了质变，成为一种由底层社会生发出的知识和学问，并通过民俗审视底层社会。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本分析大行其道，研究范式大多为揭示记录文本、田野资料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象征意义、思维方式、结构形态等，以此凸显民俗学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学科定位。神话学派、语言学派、人类学派、心理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结构学派等几乎都以记录文本为经营对象，并从中发现知识和学问。就这一点而言，民俗学与历史学并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学科认识上的误区，民俗学始终没有探寻到一条独自前行的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形成属于自己学科理论方法的机遇和可

能性。

民俗不是“思和想”的，而是“听和看”的文化形态，对民俗生活的经历、体验、感受应该成为基本的学术方式和路径。“哲学只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既不作说明也不作推论——因为一切都一览无遗，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因为，隐藏的东西，乃是我们不感兴趣的。”民俗明明白白、完完整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只需要把所见所闻所感描述出来。在传统村落，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可以给婚礼仪式的举办提供方方面面的指导，而那些谙熟“六礼”的学者面对复杂的场景则往往束手无策。相对而言，谁更懂婚礼呢？显然是前者。民俗之“民”不知何为“民俗”，民俗却是属于他们的。同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听和看”的，传承人同民俗之“民”一样，完全陌生于“物质”“非物质”“遗产”等概念，可能回答不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却是最懂非遗的人群，是当之无愧的非遗代言人。倘若传承人同民俗之“民”一样，被排斥于学科建设体制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必然步民俗学学科建设之后尘。

民俗学者的任务不是思考婚礼和定义婚礼，而是参与并描述婚礼。分析是使看不见的内容浮出表面，而描述只是对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种表达。“描述”（Description）即解释，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能够把某一工艺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也就深刻地理解了这一工艺，无须额外加以说明和分析。一般认为，本质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得以揭示，描述只停留于现象的层面。其实，描述同样可以挺进非遗的内部，因为所有的非遗现象都是其本质的反映。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这样认为：“在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所希求的一切知识，而且这是一种绝对的知识。如果相信诸现象并不告诉我们任何东西的实存，它们就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关于本质的知识，而且这在完全的意义上是必然的知识。”传承人所描述的非遗现象都具有非遗本质的基因。描述乃传承人所擅长，就是把他们所做过的事情及与非遗有关的生活现象“说”出来。即便那些不善言辞或缺乏书写能力的传承人，也可以用现场展示的方式现身说法，以现场制作、表演来传递非遗知识和理论，可谓之“行为描述”。

传承人的描述不仅仅是简单的表达，也是思考的过程，同样可以视为一种学术状态。正如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所言：

“因为它是对知觉的描述，它也可以被称为思想的表达”。同样，对于在场的师生而言，“如果你在看这个对象，你用不着思考；但如果你有由惊呼表达出来的视角经验，那么你也就在思考你看到的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的所有概念可以通过描述获得解释，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关于描述的主张，成为传承人研究非遗的方法论依据。就非遗人才培养而言，师生“必须接受的东西……，乃是——人们可以说——生活形式。”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传承人对非遗的描述既是授课，也是在从事学术活动。支撑非遗“学科大厦”的只能是非遗生活形式和传承非遗的传承人，绝非非遗概念和与非遗相关的种种定义。

传承人的自我表达、描述充满细节、情节，生动而又有温度，属于钟敬文先生所定义的“草根民俗志”，也可称之为“草根非物质文化遗产志”。这种草根言说具有学者书写不可比拟的特长。首先，传承人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他们的表达饱含对祖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浓郁情感；其次，他们身处日常生活世界，拥有地道的内部知识和本土经验；第三，他们没有深陷学术规范的窠臼，而是洋溢着自由、激情和奔放的遗产精神。传承人的自我表达、自我描述显然不符合学术规范，因而一直被“制度化了”的学科拒之门外。

既然民俗被视为知识和学问，“那么，在‘学问’范式的操控之下，从民俗生活中生发出来的诸多本土语汇应该转化为学术概念，进入民俗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同样，传承人的内部知识和本土经验不应被定性为学术观照的对象，其本身就是学术话语、学术表达，他们关于非遗的言说毫无疑问属于非遗的知识和学问，否则，非遗的知识和学问很可能被异化。如果承认非遗传承人富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言说是学术行为，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通常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学科创建的路数，显示出自下而上的自主的学科个性。

二、非遗学科建设的实践特质

民俗与非遗皆以实践为存在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保护”实践为宗旨，其学科也当以“实践”定位，这一点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存在本质差异。就目前情况而言，非遗领域的理论知识均由政府和学者所造就，是在“权力—知识”的关系中生产出来的。权力—话语—学科—政府文化机构形成了非遗知识生产系统，由此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非遗理念、范畴、价值观、意义和以条例形式呈现的相关文件、法规。非遗学科建设显然不应被这种

生产出来的知识系统所控制，而是要给鲜活的非遗知识腾出足够的运作空间，也就是要让非遗传承人进入学科建设的主体行列。

一直以来，非遗保护被主客观、主客体、自我与他者等认识上的二元架构所左右，学者疏离于研究对象，成为纯粹的认识者，并以非遗理论家和非遗学创造者自居，而传承人则与非遗具体门类捆绑在一起，成为被排斥于非遗研究及学科创建之外“僵死”的客体。作为非遗知识及相关技能的实际拥有者，传承人在非遗学科建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既然学者难以转变身份，成为非遗实践活动中的一员，那么就应让传承人在非遗学科建设中完成自我阐释、自我书写、自我建构的历史使命。倡导学科建设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多元主体是一场革命。在遵循学科建设基本规范和要求的同时，摒弃艰涩又呆板的概念游戏，实现与非遗实践的直接对接、融合，凸显非遗实践者的主体力量，这的确是非遗学科建设中值得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

非遗因“保护”而生，“保护”是非遗成为一种文化运动的根本动因。而“保护”即为实践行为，由此可以认为非遗之学乃实践之学。我国非遗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开展保护工作，投入专项资金建立非遗保护区并给予传承人生活资助。迄今为止，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来源于实践，而非理论建树——在学术界，也罕见学者指责非遗和非遗保护缺乏理论——因为非遗保护工作自始至终都是以实践的方式运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传承人之所以拥有自己的身份是由非遗实践决定的，他们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完全诉诸非遗实践，也就是传承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实践至上是非遗学科的根本性特征。投身于非遗实践的传承人显然拥有非遗学科建设的绝对话语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应当被理解为相关实践行为，非遗学科的建立聚焦于话语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率先提出了“理论实践”概念。同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则直接提出了“理论即实践”的命题，指出“人们可以在特定的实践的基础上去建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所以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

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从而把它的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理论与实践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为非遗学科建设完全诉诸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非遗学科话语的优势正在于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成熟的实践机制和行为模式，非遗实践的含义深入话语层面，恰恰可以填充所谓非遗无理论工具之缺陷。非遗学科需要理论支撑，但其理论建构过程必然诉诸相关实践，也就是话语实践。非遗话语实践不仅表现为操作行动，而且更注重“说”，即言语表达。就非遗学科建设而言，话语本质上是非遗实践。传承人所拥有的丰富的非遗实践经验就是正当的话语权，他们走进课堂，迈上讲台，言说非遗。他们所有的传授既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是行为与话语的统一体。

非遗学科话语及其话语语境构成互为依存的关系，离开特定非遗语境，话语意义的指向性是难以明确的。传承人所传达的非遗话语都是出自语境的，或者说是在特定语境中生发出来的。因此，他们的话语意义指向相当明确。非遗学科建设的理论体系理应由这类话语构成。“我们不但通过语言而且通过在行动、交流、感觉、非语言符号系统、物体、工具、技术和独特的思维、评价、感觉和信仰方式中一起使用的语言不断地、积极地构建并重构我们的世界。”传承人的话语与非遗行动、技能、感觉、需求乃至信仰是难以分割的，其中裹挟着与非遗有关的各种要素，可以在学科建设中重构非遗的实践世界。

非遗学科离不开人才培养、课程与教材、学术研究、科研平台等。就课程而言，教授们只能开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非遗条例与法规》《非遗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等寥寥几门课程，可言说的话语相当单调、僵硬而又封闭，而所有非遗门类都有杰出传承人，他们各自代表一定的区域和文化传统，这是一个十分广博、丰富且紧密围绕非遗话语构筑起来的课程体系。同时，这一课程体系中风格品味和民族属性之间又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交织成相互关联、极富张力的课程系统，汇聚为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性质的非遗文化传授图式。当然，实践知识转化为课堂知识还需要精心谋划，但无论如何，是由处于非遗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非遗传承人根据人才培养的目的和传授意向来操作的。唯有依靠传承人，才能开创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性质的非遗人才培养的实践范式。非遗学科建设也是权力运转的过程。“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非遗领域的学者

从属于相关部门，被相关部门所聘用并授予专家头衔，同时又以非遗保护及其学科建设为己任，并且认为非自己莫属。非遗传承人的事业只是实践和传承非遗，此乃理所当然，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状况，传承人也安于甚至满足于这一状况。倘若非遗学科建设只以学者和教授的意志为转移，在实践与理论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弥合的鸿沟，就偏离了实践至上的非遗保护宗旨，也与非遗学科的性质相违背。

三、非遗知识的重新认定

传承人进入学科建设全过程，这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生活属性，民间的美术、工艺、歌舞、音乐、文学等绝非纯粹的审美形态，而是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作为非遗生产生活实践者的传承人对于学科建设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重要性。

凡非遗都具有“展示”属性。民间工艺美术展与精英画家作品展存在明显差异。画家、书法家作品展示的是最终成果，并不提供作画和运笔的过程，或者说无法将成画、成书的经历叙述出来，其构思、技法运用、创作灵感和动机等都是隐藏的。几乎所有的精英成果的展览都是如此。以作品说话，作品就是一切，“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是精英艺术家们的共同境遇。但民间工艺美术的展示如果仅为作品，就极有可能丢失其核心的内容。因为民间工艺美术不是纯粹的艺术产品，除了其审美价值以外，还蕴含不可或缺的使用性和生活功能。印染、制陶、编织、雕塑、绘画等，对民间而言，绝非知识技艺，而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技能，属于生存之必须。民间工艺美术的呈现离不开语境和上下文，否则，展示就是局部的、不完整的，甚至是片面的。立足生活方式呈现民间工艺美术可谓最高境界，即将民间工艺美术置于生活语境当中，回归生活本原。生活层面的民间工艺美术所交织的内部话语是学者们难以掌握的，唯有传承人出场，民间工艺美术如何被创作、被运用、被传承才得以再现，作品方能回归至日常生活世界，还原为其本来的生活状态，并体现“民艺”话语之“民”的主体性。

同理，在课堂上，仅从美学角度解释民间工艺美术作品是远远不够的，对作品外延和内涵的整体性把握，唯有传承人可以胜任。试想，有谁比传承人更理解自己的作品呢？唯有传承人能够在生活的层面透示民间工艺美术的历史与现实。离开了传承人，对民间工艺

美术作品的解释充其量只能达到“民间性”的层次，即体现民间的视阈，但终究不是真正的民间。“作者已死”显然不适合民间工艺美术的范畴，传承人也不是“作者”的身份所能涵盖的。除了创作，传承人还肩负传承、运用、展示、言说等多重任务。缺少了他们出场演示，非遗课堂终归是纸上谈兵，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

非遗学科的创建要另辟蹊径，首先应该消解固有的分类系统。在民间，艺术各门类的边界相对模糊，歌、舞、乐往往糅合在一起，武术和体育更是浑然一体，雕刻中有绘画，绘画中有印染，区别的只是工序。按已有分类体系套用非遗，很可能与实际情况相悖离。其次，非遗的知识谱系不是纯学术的和理论化的，而是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体验、感悟、经历是获得非遗知识和能力的必要途径。就这两点而言，学者们的学科背景、知识储备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与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的观点似乎过于绝对，拥有非遗知识的传承人并没有拥有实施建立非遗学科的权力。非遗学科依照现在的范式建设，便完全受制于学者们的话语霸权，必然导致传承人作为非遗主体的话语权缺失。这是一个单边主义的学科建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活生生的非遗及其传承人异化、概念化为符号式的学科知识，并淹没于学者们所营造的非遗学科的话语场（Discourse Field）中。

如果说当今非遗领域的学术状况有不尽人意之处的话，那便是一元论和同一性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一系列相关保护条例和政策的出台，颇具压制力量的共识性理念、普遍性标准更为通行，这必然影响到非遗学科内在追求的学术指向性。然而，在非遗世界里，多样性是最基本的状况，只有在看到差异并接受差异的基础上加以审视，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非遗世界。“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每一位传承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与他们所秉承的非遗融为一体。他们进入非遗学科建设之列，即体现了非遗世界的多元主义。

非遗世界色彩斑斓，每一位传承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个体化知识，这是他们自己通过长期从事非遗事业所累积起来的。总体而言，非遗知识必然是多元且充满内部差异的。非

遗学科建设倘若没有传承人加盟，这种与生俱来的个体化和差异性就难以显现，甚至可能误入歧途，陷入一元和同质化的狭隘困境。

今区分非遗学者与非非遗学者的边界，主要是看其有无非遗知识，而且是从内部视角着眼，都侧重于非遗概念、保护条例、保护过程、分类、定义等，如此由学者构拟的书本知识划定的区分标准，是一种静态的标准。其实，应该确立本体论的视角，即从相关主体对非遗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来判定，也就是动态的标准。葛兰西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在社会中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他所提出的著名理念“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赋予从事非遗实践活动的传承人以知识论层面的合法性证明。传承人的技艺和经验也是合法性知识，他们理应被纳入非遗知识分子的行列。如何使传承人具有知识分子即非遗学者的职能和身份，这是非遗学科创立和发展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传承人是没有学科制度资格证明的人，而且因为学历、职称等资质门槛，长期以来被排除在学科建设与学科运作之外。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指出，有关科学知识的决策应当向“外行”开放。“外行”即那些没有经过学科训练者，传承人即是。禁止传承人参与非遗学科建设，只会造成非遗学科陷入一味说教的境地，不利于学科的建立与实践。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可能被视为没有文化的人群，因为按现在通行的判定，文化主要指受教育程度。曾几何时，履历表上“文化程度”一栏，填的是学历学位。在非遗知识生产过程中，受教育的方式和受教育的内容不是由非遗拥有者即传承人决定的，而是取决于非遗知识生产途径和机制——被教育主管部门掌控，学校则是执行教育主管部门指示精神的最重要场所。问题是非遗知识并不一定生产、传授于学校，传承人所秉承的非遗经验、常识、记忆和行为技能难道不属于知识吗？这些才是非遗得以生存的根基。创立和建设非遗学科的过程中甚至可以忽视书本知识，但绝不能缺少经验、常识、记忆和实操技能。

非遗知识呈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学院派构拟的非遗，一是自发的非遗，不同层面的非遗知识构成对应的等级关系。前者处于非遗知识的中心地位，后者没有脱离日常生活世界，由具体操作行为、言语、道具、表演、场域、时空语境、相关仪式等组成，属于一个具有

时空维度的完整系统，传承人为其主体。但传承人难以超越其经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所处的生存环境，因此要帮他们融入学科建设队伍，还要逐步强化其学科自觉意识，以便与学院派学者一道，组成感性和理性贯通的师资团队。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认为：“科学的大部分已越过了狭窄的理性主义或‘科学的人文主义’划定的界线而成为不再排斥‘不文明’和‘不科学’文化的思想和方法的探询：在科学实践和文化多元主义之间不存在冲突”。非遗学科建设同样应该从理性主义、一元主义之中解放出来，以开放的态势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学科建制的途径，摆脱学院派在知识方法论上的垄断地位，还给传承人及其感性认识在学科建设中的一席之地。非遗学科之特质在于对精英主义学科观念唯一性之批判，在于其创设主体之多元。

四、结语：传承人学科地位的确立

在学科创建初期，就应该明确学科建设的主体。传承人参与非遗学科事务，一方面扩大和深邃了学科视阈，使学科体系溢出单一的书本知识范畴，向着无限广阔的生活世界迈进；另一方面，又是非遗生活世界的再生产，非遗实践的内部表达直接转化为学科话语，使之成为非遗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一个热点，在于其呈现出无比驳杂的生存样态和难以穷尽的历史积淀。这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坚实基础。要保障这一遗产优势在学科建设中得以充分释放出来，唯有改变传承人作为“他者”身份的现状，给予他们明确的主体地位和充分的施展空间。在非遗学科建设中，传承人不仅可以供给极为丰富而生动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资源，改变课堂教学模式，而且有益于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非遗学科体系和学派。

往深层理解，“传承人”不只是一种身份、或被转换的身份，而且处于非遗保护的核心地位，也是学科建设所有环节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甚至可以作为一门课程、一种方法、一条通往非遗保护的必由之路，归结为非遗学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这些都有赖于传承人学科地位的重新确立。传承人的进入，可使学科建设体现为模仿的、直观的形式，彰显直接的感受感性，契合非遗的现场、实践和感性特质。尤其感性的张扬，是对学科建设中惯常理性模式的一种方法论的反叛，这种反叛或表现为学科建设现代性所指向的生活本原的回归。传承人是非遗学科建设救赎的主体要素，一旦与学科建设结成同盟，便

化身为充满了感性力量的群体，俨然是实现学科建设方式和路径变革的先锋。

在很大程度上，非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并非仅得益于传承人的“传承”，而更在于传承人形象的塑造，在于给予传承人发言的地位、发出自身诉求的权力，在于唤醒他们参与学科建设的文化自觉意识。一旦他们被赋予学者、教授的头衔，其自我表达（Self Representation）的欲望便能尽情释放出来；同时，非遗学科知识系统便溢出了书本，蔓延至无边无垠的广袤田野。如此，非遗学科建设的基础何其坚实，发展后劲何其强大。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原文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转自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2021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版发布暨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十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

6月8日，《2021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版发布暨《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十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董耀鹏，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张雁彬出席会议。中国文联所属各全国文艺家协会、机关有关部门、直属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十年《报告》首席专家、编写组成员共150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联出版社主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艺术发展报告》主编徐粤春主持会议。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2022年即将迎来党的二十大召开，《中国艺术发展报告》编纂出版这十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十年。十部《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如同一位忠于职守的观察员，见证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见证

了中国文艺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热火实践；见证了中国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曲艺、舞蹈、民间文艺、摄影、书法、杂技、电视、文艺评论、网络文艺、文艺志愿服务的发展轨迹，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国艺术百花齐放、繁花似锦的恢弘气象，为中国艺术留存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李屹为新书《2021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揭幕。会前，他对《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版十周年作出批示：“《中国艺术发展报告》编撰出版十年来，在总结工作成绩、审视存在问题、深化理论学术研究、凝聚业内共识、引发前瞻思考、加强工作指导等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作用。望再接再厉，高质量打造好这个品牌。”张雁彬宣读十年《中国艺术发展报告》首席专家名单。李屹、董耀鹏、张雁彬向十年来为《中国艺术发展报告》作出重要贡献的 54 位首席专家和 20 家单位部门颁发荣誉证书并赠书。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首席专家、负责部门、出版社和读者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多部“民间文艺”分报告首席专家潘鲁生，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十部“总论”首席专家王一川，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2021 年“电影”分报告首席专家丁亚平，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副学部长、教授、近年“网络文艺”分报告首席专家彭文祥，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近年“曲艺”分报告负责人杨发航，中国文联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尹兴，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冰等从不同角度回顾和总结了《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十年来的编纂成果和经验。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既有高度又有温度，是以理论性深描的方式回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黄钟大吕，是镌刻艺术发展的年轮；通过参与考察这十年中国艺术发展，可以更加真切地触摸到百年来中国历史的丰富画卷和中国文艺的坚实足迹。踏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艺术必将在各门类各领域互融互通中迸发新的创造力，抒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篇章。广大文艺工作者应打开看待当下文艺发展创新的新视角和新格局，努力为推动中国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董耀鹏指出，《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十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文艺行业的知名项目和中国文艺界的重要品牌，全面、系统、生动诠释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培根铸魂、团结奋斗、锐

意进取、守正创新上的担当与作为。经过十年的探索实践，《报告》编纂工作的思路日益清晰，措施更加有效，并初步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工作队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经验：一是始终坚持正确导向，勇立时代潮头，把准历史方位；二是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彰显艺术价值，推动行业发展；三是始终坚持创新理念，体现前沿思考，把握规律趋势；四是始终坚持群策群力，有效汇聚力，形成机制队伍。同时，他希望《2022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和今后的《报告》编纂工作要做到“五个统一”：政治方向与学术品格相统一、行业格局与文联视角相统一、规范框架与各具特色相统一、组织主导和依靠专家相统一、做精内容与扩大影响相统一。

十年来，《中国艺术发展报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彰显艺术文化价值，促进行业繁荣发展，展示行业发展成果，观察艺术发展趋势”为宗旨，始终坚持正确导向、把握时代主题、把脉文艺发展。作为艺术界集体智慧的结晶，《报告》从中国艺术行业发展的现实出发，着眼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集呈史、集论、前瞻功能于一身。它对中国艺术发展年度成果、发展态势和对策建议的梳理与思考，彰显了历史的纵深视角和时代的广阔视野，表现出独有的系统性、原创性、专业性。《报告》还紧跟时代潮流，直面热点问题，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是具有时代性、创新性的年度艺术理论研究成果。

《2022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编纂工作也于当天正式启动并将于 2023 年春出版。

（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文艺评论”）

“乡村振兴 民艺赋能——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民艺精品晋京展”隆重开幕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为展示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推出的“民艺资源普查、晋京展览和推广宣传”项目成果，进一步推动民间艺术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探索和实践，6月23日，由中国文联办公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

会共同主办的“乡村振兴 民艺赋能——陇南市武都区民艺精品晋京展”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隆重开幕。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俞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雁彬，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张立平，区委常委、副区长牛军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华丽等各部门负责同志、民间艺术家代表，以及中国文联机关各部门、各文艺家协会、各直属单位的领导，中国民协顾问张鋈、乔晓光，在京主席团成员万建中、赵世瑜、林继富等嘉宾共计 60 余人出席开幕式。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邱运华致欢迎辞，张立平和武都区民协名誉主席、剪纸艺术家袁长流分别代表武都区委区政府和民间文艺家发言。俞峰宣布展览开幕。开幕式由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侯仰军主持。

邱运华简要介绍了中国民协在武都区开展民艺资源普查的主要情况，他指出，民间文艺是最具人民性的文艺形式，也是距离老百姓最近的文艺，优秀的民间文艺更是乡村文明建设重要构成。用民间文艺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是中国民协的独特创造，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呼唤的必然选择。中国民协将在中国文联党组的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脱贫不脱钩、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的要求，承担起与武都区的结对帮扶工作，进一步发掘当地民间文艺资源，宣传推广民间文艺产品，使全国乃至全世界更多人关注武都文艺事业发展新成就，关心武都民间文艺新进展，关爱武都民间文化传承保护双创新成果，和武都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创造武都美好未来。

1998 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中国文联开始了对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的定点帮扶工作。24 年来，中国文联发挥文艺资源优势，结合帮扶地区各方面要求，探索出一条以文艺帮扶为主线，产业帮扶、科技帮扶、消费帮扶等多举措并举的特色帮扶之路，对促进武都各项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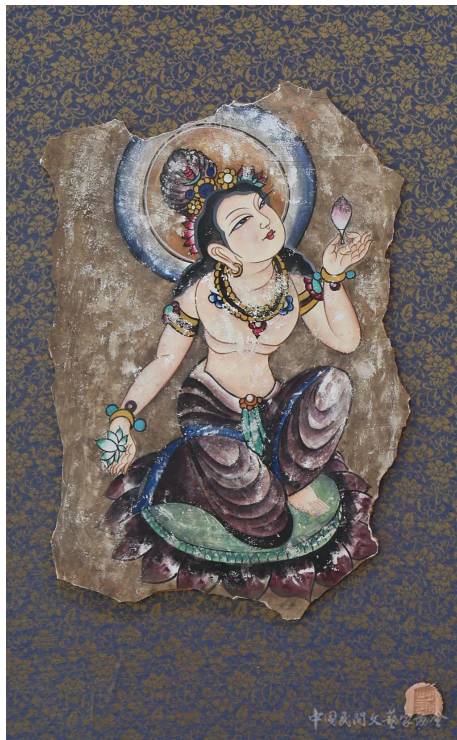
展览集中展出了武都民间艺人精心创作的民艺作品五大类、十种，包括紫泥文创产品、布艺贴画、雕刻、剪纸、高山戏等，共 800 余件。这些民间艺术作品以朴素的形式表现了武都人民对艺术的追求，对历史文化的珍爱，对美好生活的理解。

展览采取了图文、实物和戏曲音乐兼具的方式。武都高山戏传承人、著名旦角演员秦

平艳现场演唱了经典曲目《十杯酒》，博得阵阵掌声。

展览由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共陇南市武都区委、区政府、宣传部，陇南市武都区文联、区民协联合承办。

部分作品欣赏





(中国民协供稿)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编写启动会在线召开

4月28日下午，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线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编写启动会，向社会披露了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最新建设进展。这标志着我国非遗学学科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界和学界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整理、保护了中华大地上浩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迅速消减的传统村落建立了一批文化档案。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将非遗家底基本摸清，逾十万项进入国家四级（国家、省、市、县）非遗名录。以进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作数量而言，我国已居世界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非遗大国。

然而，面对以“活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既没有一整套科学的保护标准、方法和制度，也缺乏可资借鉴的保护经验。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庞大、形式缤纷，极大地增加了保护难度，且一旦失去本色，便会得而复失。基于此，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冯骥才先生以《建立国家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为题发言，系统阐述了“科学保护是根本、人才培养是关键”的观点，明确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设置成为独立学科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2021年3月，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同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推动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人才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和博士点”。

作为我国非遗保护与研究事业的重镇，拥有二十余年保护经验和学术积淀的天津大学率先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点申报工作。202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批准通知，批准天津大学设置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这标志着非遗学科正式进入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也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事业从“抢

救性保护”进入“科学保护”的新阶段。

我国高校开展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而教材作为重要媒介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天津大学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材编写工作，并隆重召开本次会议，旨在推动系列教材编写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天津大学省委常委、副校长郑刚，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出席会议。

郑刚在致辞中提到，尽管我国在非遗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探索经验，但由于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支撑，真正适用于课程教学的核心教材并不丰富，“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依然存在。此时启动非遗领域核心教材编写工作，意义重大，这既是加快非遗领域理论知识系统化、体系化的迫切需要，也是深化非遗学科内涵、造就高端人才的迫切需要。

本次会议宣告，天津大学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冯骥才先生担任编委会主任、系列教材总主编，潘鲁生、向云驹、苑利、顾军、方明、唐家路等12位专家担任编委会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论》《民间文艺学教程》《传承人口述史教程》等首批3本教材编写工作正式启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大学特聘教授向云驹，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教育部高校设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潘鲁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民艺研究所所长唐家路，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教授郭平，担任三卷教材的主编。冯骥才先生与校领导共同向首批教材编委会委员颁发聘书。

会上，冯骥才先生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发表了讲话：

第一方面，他阐明了非遗学学科设置对于国家文化事业发展和非遗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他提到，“非遗人才培养从此有了专线，也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我们要为非遗学科设计一套教材、讲义、读本，要为非遗学生准备好丰足的学习资源”。

第二方面，他认为非遗教育要牢牢抓住三项工作：一是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而明晰的理论体系，这是教学的根本，也是学术的根基；二是将田野教育作为非遗独特的教育方式，因为田野是非遗学最重要的工作场域和工作方法；三是要与培养目标紧密结合，不仅要培养研究人才，更要培养管理人才。

第三方面，他谈到非遗学科建设应加强学科交叉。他提到，“非遗学科应着重培养管

理人才，因此要与管理学的专家和教师合作，这也是为何将非遗学科放在交叉学科中来建设的缘故”。他还透露，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将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开设“习近平谈文化遗产”的课程。

会议最后，冯骥才先生动情地说：“非遗是伟大的不可再生的历史财富，但它是活态的。它需要长盛不衰，它文化的精髓必须代代相传。只有学科才能为这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科学的保证。我们做这件事，就像建设一座大厦放下的第一块砖。这块砖是根基性的，一定要放正、放好、放实、放稳。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领域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工作，力求涵盖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的主要领域，填补我国高校非遗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中的空白。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教研部成立教材编辑室，首批三卷教材拟于年内完稿，新学期即可在教学中使用讲义。

在非遗学科教材编写启动会上的讲话

冯骥才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媒体的朋友，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参加这个重要的会。

向云驹早在 2004 年就出版了第一部非遗学著作。苑利也很早就出了一本非遗学著作。听云驹这次的发言，他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论》教材的思考，跟他写学术著作的思考不一样，有新的东西，对我很有启发。

还有刚才潘鲁生的发言。他的确既是一流的文化专家，也是教育的专家，做得非常专业。鲁生在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就写过一本关于民艺学的书。现在他对民艺学的想法，实际是过去没人敢想的，就是把其他的民间艺术学放进来。这是一个创新，而且马上就进入教材，也是教材急需的。我觉得今天收获很大。也感谢跟鲁生一起工作的唐家路教授和他的班子。

2021 年 10 月 26 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我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交叉学科的硕士学位的授权点，落户于天津大学。由此，我国高等教育正式设立了非遗学科。这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培养进入了一个高层次、专业化的全新

的历史阶段。有媒体形象地称非遗人才培养“进入了快车道”，我觉得它更是一条专线。过去一些大学着急想培养非遗人才，当时我们是绕着从别的学科来招生，这回名正言顺了。

非遗学科的设立，表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非遗事业的高度重视，表明科学地保护和发展的非遗是时代之必须，表明培养非遗的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是高等教育的使命。对于非遗学科设立的深远意义，我相信明天会比今天看得更清晰、更深刻。

我们作为率先设立非遗学科的大学，经过了半年多将近一年的努力，成立了非遗学的学科建设的专家委员会，研究和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推动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非遗方向人才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遗保护工作的意见》，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完成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录取工作，制定了教材编写的总纲和计划。

非遗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今天开始启动。刚刚宣读了编写委员会的名单、编写大纲，并请第一批三本教材的主编简要讲解了主编思想与内容纲要。

学科建立不是一所大学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我们将和有志于非遗学科的大学联合起来，一起努力，让它成为我们共同奋斗的事业。

在各个教材的编写上，我们从全国邀请了学术功力深厚、文化视野深广、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专家来担任主编。今天第一批教材三本书的编写开始，一本是非遗学的，一本是民间艺术学的，还有一本是传承人口述史的。很快我们就会有第二批、第三批陆续启动，包括文化遗产学、田野调查方法、传统村落保护、视觉人类学等等。

非遗规模庞大、种类繁多、分类复杂、性质各异，它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历史性、民俗性、民族和地域性、原生性、动态性。非遗学本身就是一个交叉学科。我们要为非遗学的学科设计一套教材、讲义、读本，要为非遗学的学生们准备好必备的和丰足的学习食粮。

当然，非遗学的学科建立难度很大，面对压力。首先是非遗的体量太大，种类太多，而且它五彩缤纷地融合在生活里边，需要全面和透彻的文化认知，需要学术整合，还需要学界的理论共识。二是“非遗”这个概念闯进我们的生活不过20年。20年来，大学的非遗教育并不规范，也不名正言顺，因此缺乏可资借鉴资源和经验。三是大地上的非遗的保护和发展迫切需要理论支持，迫切需要专业的管理人才。只要我们站在田野里，站在大地

文化中，就能强烈感受到这种压力。

前年跟总书记汇报的时候，我讲过日本和韩国很早就开始搞非遗，到现在他们宏观的理论虽然不多，但是他们每一项非遗的后边都有专家。而我们的大多数非遗后边是没有专家的。各地方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管理非遗，当然都是好心，但问题比较大。因为没有科学的理念、标准、规范，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得而复失。而遗产的特点是，一旦被破坏了，变样了、走形了，它就回不来。

所以在非遗教育上，我们要牢牢抓住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我们的教材，首要任务是为非遗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明晰的理论体系，这是教学的根本，也是学术的根基。

二是要找到非遗独特的教育方式。非遗的教育方式应该与非遗的特点相一致。非遗跟精英艺术不一样，它是融在生活里的，是一种活态遗产，也是生活的文化。田野便是非遗学最重要的工作场域，也是工作方式之一。如何建立非遗的田野教育方式，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不是下去搜集一下材料就可以了，我们跟田野是共生命的。

三是非遗教育要与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高等教育培养的是两种非遗人才，一种是研究人才，进行学理的研究；还有一种很重要，就是管理人才。本科和硕士所培养的更多是管理人才。博士培养的更多是研究人才。

在这里需要展开一下。2003年联合国建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是缔约国。当时，我们国家已经在做两个工程，一个是文化部牵头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后来文化部按照联合国的叫法，改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个是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牵头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因为民协里都是民间文化的学者，按照学术界的传统叫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相对于精英文化的称呼，是大地上的老百姓创造的一种文化。非遗做的是民间文化，但它不等同于民间文化。比如书法是精英文化，但中国的书法进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这个概念实际是政府的概念，不是学术界的概念。政府有政府的做法，首先要把非遗项目化。学界要帮助政府建立非遗的国家名录，渐渐也接受了政府的非遗概念。政府的行为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进入了非遗，就是管理。所谓非遗的管理，最重要的是保护。因此非遗学就有管理的内容，就要培养管理的人才。而且非遗管

理人才是急需的。

要培养非遗管理人才，在教材上就需要建立非遗的管理科学，需要请管理学的专家教师参与合作。这也是将非遗学科放在交叉学科中来建设的缘故。

在建交叉学科方面，我们还做了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与天津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一起研究，开设“习近平谈文化遗产”的课程。习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的论述完整、明晰、透彻，与四个自信紧密相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非遗工作和非遗教育的思想指导和理论指导。这是非遗学科教育的重中之重。

进入 21 世纪 20 年代，我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非遗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育事件。

近 20 年来，我国政府投入巨大力量，文化界也踊跃投入进来，对非遗展开大规模、全面的抢救、调查、整理、立档，可以说把中华大地上的非遗基本上盘清了家底。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保护、弘扬、发展。只有科学保护，只有大量的专业人才的投入，我们的文化遗产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在这 20 年来，我国的非遗研究和理论建设空前活跃，非遗学从无到有，我们站到国际的学术前沿。现在，非遗学的学科在高等教育中的设立，无疑给非遗事业带来希望。我们将源源不断培养专业的人才，给非遗以科学的认知、管理和保护，给非遗事业注入科学的力量。

非遗是伟大的不可再生的历史财富，但它是活态的，它需要长盛不衰，它文化的精髓需要代代相传。只有学科才能为这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科学的保证。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做好。我们做这件事情，就像建设一座大厦，现在要放下根基性的第一块砖，一定要放正、放好、放实、放稳。

希望校内外的专家共同努力，全国各个大学共同努力，把这个关系我们民族文化命运的事业做好。

（转自微信公众号“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6月2日上午，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历时3天，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胜利闭幕，86位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

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艺如乐图出席闭幕式并讲话，闭幕式由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李崇辉主持。

会议通过了《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届主席团关于聘请名誉主席、副主席的决定》《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届主席团关于聘任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决定》《关于〈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修改草案）〉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伊和白乙拉当选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苏雅拉图等11人当选副主席。

第十届主席团聘请布和朝鲁为名誉主席，代林、关红英、那顺巴依尔、铁安为名誉副主席；聘任伊和白乙拉为秘书长，高特木乐、包玲玲、李润平为副秘书长。

伊和白乙拉代表新一届主席团表示，将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有序开展民间文艺活动，推动重大项目和主题创作，推出重要成果。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以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继续坚持学术立会的传统，聚力打造民间文艺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深耕民间文艺园地，浇灌民间文艺百花，培育民间文艺人才，开创我国民间文艺事业蓬勃发展新局面。

艺如乐图在讲话中强调，在今后的工作和创作中，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自治区文联的要求和希望，转化为开展工作的行动指南，落实为推进内蒙古自治区民间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强劲动力。

（转自微信公众号“内蒙古民间文艺”）

广东云浮举行 2022 年“伍丁诞”民俗文化活动

5月8日上午，由中共云浮市委宣传部、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云浮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主办，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指导，云浮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2022年“伍丁诞”民俗文化活动暨第三届“伍丁杯”全国石艺雕刻竞赛在广东云浮市云石遗址公园启动，云浮市副市长徐贤荣出席启动仪式。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丽娜，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东岭南民间工艺研究院院长陆穗岗，云浮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梁子蔚，云城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树兵，云浮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曾云平，以及云浮市部分石材石艺行业代表和艺术家参加活动。启动仪式由云浮市文联主席叶胜主持。

曾云平表示，启动“第三届伍丁杯全国石艺雕刻竞赛”并向全国同行发出邀约，这在全国掀起了石艺雕刻创作竞技热潮，形成了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全国竞赛品牌。同时云浮计划申报“伍丁杯”知识产权，有助于推进云浮石艺申报中国地域文化名片——“广东石艺巧雕之都”的工作，促进人才技能和文化产业发展。

李丽娜在致辞中指出，近年云浮市重新恢复了中断五十多年的“伍丁诞”民俗文化活动，同时结合“伍丁诞”的文化内涵，成功举办了两届全国“伍丁杯”石艺雕刻大赛，形成了全国石艺雕刻大赛的知名品牌，推动了石艺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有效地提升了云浮石艺在全国的影响力。她希望云浮市民协和各位民间文艺家以弘扬、传承民间工艺为己任，进一步发挥民间工艺在提高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不断加强与兄弟省市的民间文艺交流，深入挖掘本土民间文化艺术，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中华民间传统文化，推动中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转自微信公众号“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心手相承——中国蓝印花布长三角巡展” 在江苏南通展出

5月20日，“心手相承——中国蓝印花布长三角巡展”（南通站）在南通美术馆展出，此次展览是江苏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通过在长三角地区巡回展出，传递蓝印

花布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

蓝印花布是中国传统的刮浆防染印花布，它源于唐宋、盛于明清，从江南起源后流传至全国，其中，南通蓝印花布令人瞩目。本次展览共展出 156 件作品，均为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及南通大学蓝印花布艺术研究所从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收集而来的古旧精品，以及创新设计的新纹样、新作品。同时，此次展览在浙江宁波站、上海站巡展的基础上丰富了展品的展陈形式，通过装裱艺术，使蓝印花布古旧藏品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

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玉琴，南通市文联主席姜平，蓝印花布博物馆馆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元新等参观展览。

（转自微信公众号“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 NTBCM”）

四川省民间文艺精品专题创作培训会于绵阳召开

5月26日，由四川省文联指导，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绵阳市文联主办的“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四川省民间文艺精品专题创作培训会在绵阳召开。中国民协顾问、四川省文联顾问沙马拉毅，四川省文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江永长，四川省民协主席孟燕，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和版权局局长温芬，绵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晓霖和四川省民协主席团、绵阳市民协主席团及来自全省各市州的一线民间文艺创作者代表，共计 60 余人与会。此次培训旨在通过专题学习、专家讲座、创作交流、现场教学等方式，提升学员创作水平，力争创作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民间文艺作品，为党的二十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培训活动由四场讲座、学员交流和现场教学活动组成。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江永长以《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题上了第一堂课，带领大家从《讲话》发表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地位等方面对这篇在我国文艺史上举足轻重的文献进行了深入学习。

26 日下午，四川博物院首席专家、研究员魏学峰以《论非遗的活态传承》为题进行

了首场专家讲座。他从非遗的文化空间、非遗是一种“生活事件”等方面讲述了现代社会如何对非遗进行保护和活态传承。四川省美协一级美术师刘忠俊结合实际创作，作了题为《唐卡的传承与创新》的讲座，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民间文艺创作要深入学习传统文化，善于分析总结，取其中感兴趣的部分大胆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创新之路。

随后，与会人员学习了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教授录制的视频课件《空花·用中国剪纸讲世界的故事》。乔晓光指出，创新需要真正地进行创作，而不是简单地模仿与移植，更不是一种简单的变化。

26日晚，孟德芝、谢成飞、尹天润、陈世云、陈云珍、杨春艳、胡国兵、着着等8位民间工艺美术一线创作者从成长历程、创作故事、主题创作计划、民间工艺的市场探索、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和体会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沙马拉毅作总结发言，他希望大家都能做民间文艺的坚守者，深入群众，突破自己，不断创新，努力创作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好作品。

5月27日，学员们先后前往炳林笔庄、鑫田粮艺传习所、云珍羌绣生活馆、北川羌族草编传习所、北川羌族水磨漆艺传习所、绵阳市博物馆交流学习。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两天的集中培训课程时间紧凑、内容丰富，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学习，又有切实可行的经验交流，帮助自己从更高的视野、更大的格局认识了所从事的民间文艺事业，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培训会后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努力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高扬时代主旋律的民间文艺作品。

（转自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2022 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讲堂暨“新峰人才” 培训班圆满落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传

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间文艺优秀青年人才，5月25日至28日，由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台州市文联共同主办的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讲堂在台州市椒江区香溢大酒店顺利举行。此次培训邀请四位知名专家学者，给学员们带来了内容丰富的课程。

本次活动共有91人参加，其中包括浙江省民协工艺美术新峰计划人才30人、浙江省民间中青年工艺美术创作人才及台州市本地民间工艺创作骨干61人。

5月25日下午，学员们来到黄岩博物馆和台绣博物馆现场学习，浙江省民协副主席、台绣传承人林霞介绍了台绣技艺。

5月26日上午，在开班仪式上，浙江省民协副主席、秘书长郑蓉主持仪式并讲话，台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曹蕉红致辞，台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坚勇，浙江省民协副主席、台州市民协主席林霞，浙江省民协副秘书长蒋建云出席会议。

曹蕉红代表台州市文联对来自全省各市的学员表示热烈欢迎与衷心感谢，并希望学员们通过学习培训获得面向未来的创作源泉与灵感，创作出更多表现时代潮流的精品力作，勇攀艺术高峰。

郑蓉回顾了“映山红”讲堂从2016年创办以来取得的成果，指出将“映山红”讲堂与“新峰计划”人才选拔终评相结合，有助于促进青年人才相互学习、交流。同时她阐述了学习培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学习培训、参观交流是提高中青年民间文艺人才的艺术修养、审美情趣、理论水平、创作技艺和创新能力的迫切需要；希望学员们珍惜与国内外知名专家接触的机会，遵守纪律，将好学、积极、上进的学风延续下去。

开班仪式结束后，原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田宇原进行了以《在文化自信中寻找艺术的自我》为主题的讲座。田宇原围绕“文化自信是总书记系列讲话中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从重大历史事件看中华文化遗产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必然”“文化自信应建立在对我们生活方式、审美习惯的全面批判继承之上”三个方面，为学员们的艺术创作指明方向。

26日下午，杭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2020年“新峰计划”人才（摄影）蔡旭荣进行了以《掌里乾坤，造心外佳境》为主题的讲座。作为从事文物拍摄的青年摄影师，蔡旭荣介绍了大量自己拍摄的文物照片，从摄影的角度与学员分享如何使用光影艺术和人文美学、哲学美学为作品二次艺术赋能。

5月27日上午，中国政协副主席、浙江省民协主席杭间以《六书与中国视觉设计思维》为主题进行讲座，以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作为对学员们的期待。他提出，蔡元培所说的美育是以装饰艺术为主的生活艺术，也就是工艺美术。而这句话中的“宗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广义上的“宗教”，其内涵蕴藏在端午祭祀屈原、春节祭祀灶王爷这样的民风民俗中，体现在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创作的闰土、九斤老太、孔乙己、吴老太爷等形象中，是民俗中的“宗教”。之后，杭间提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凝聚物，并从汉字是中华民族根脉的象征，汉字与中文准确、优雅的方案，汉字的现代生命力三个角度，与学员分享了自己的想法。

27日下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兼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吕品田以《手工特性与手工艺创作原则》为主题进行讲座。他首先通过人手与猿手的对比，阐释了人手“在我”、“在手”、“在身”的意义，指出手工艺的本质就是创新；之后，提出了手工创作的四条原则：应物象形、因地制宜、因材施艺、各物致用，并通过太师椅、百衲衣的生动举例向学员阐述了手工艺对社会的教化作用。

27日晚，“映山红”讲堂讨论座谈交流会举行。交流会由郑蓉主持。会上，各位学员分享了自己在两天学习过程中的感悟与疑惑。郑蓉在听完学员的分享之后进行了总结，“新峰计划”从2016年以来已经举办了六届，产生了72位“新峰计划”人才，希望在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浙江民间工艺从业者参与到“新峰计划”与“名家孵化计划”中。

5月28日上午，2022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讲堂培训班正式结业。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吕伟刚，台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曹蕉红，台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坚勇，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台州市民协主席林霞参加了结业典礼。会议由郑蓉主持。

吕伟刚提出，“映山红”讲堂已经在台州举办两次，是浙江省文联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对文联深化改革要求，将文艺活动放到基层举办的举措。作为“新峰计划”的重要平台，“映山红”讲堂自举办以来，凭借自身优秀的师资力量，为学员提供了一个扩宽视野、提升学养的平台。

结业典礼结束后，吕伟刚与学员们来到台州市书画院，参观了“新峰叠翠”2022浙

江省优秀青年民间工艺人才作品，互相学习交流。

（转自微信公众号“浙江民间文艺”）

“花儿文化与乡村振兴”全国学术论坛 在甘肃岷县召开

6月14日，由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共岷县委员会、岷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花儿文化与乡村振兴”全国学术论坛，在“中国花儿之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民歌采录基地”定西市岷县召开。本次论坛旨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地传承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花儿”，以优秀的民间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甘肃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马青山出席论坛并讲话，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新强致欢迎词。甘肃省民协常务副主席杜芳主持论坛交流发言，并做论坛小结。

马青山指出，要通过理论研讨，积极探索如何更好保护、传承、发展包括“花儿”在内的民间文化，使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发挥更大作用。他对今后的“花儿”研究提出了几点希望：进一步加强田野作业，进行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研究视角；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人才培养。

本次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音乐学院、厦门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北民族大学、兰州文理学院、天水师范学院、兰州城市学院、甘肃省社科院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花儿”研究者、非遗保护工作者共30余人参加了论坛。

本次论坛以“花儿文化与乡村振兴”为主题，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花儿与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花儿及花儿会与乡村社会治理”“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花儿文化实践者的队伍建设”等多个问题就各自的学术观点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陶立璠指出，过去对“花儿”文化的保护，更侧重于对“花儿”文本的研究，他希望今后对“花儿”文化的保护传承能够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注重“花儿”文化传承的生态保护，把“花儿”文化与乡村振兴联系起来；二是文化空间是“花儿”传承的依托所在，传统的演唱时间和地点是不能变化的，花儿演唱的生态要得到完整的保护，使其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加强对“花儿”传承群体的关注与保护；三是避免“花儿”过度表演化，避免文化保护政绩化；四是要认识到田野调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建议编纂甘肃地方“花儿”名录，以保护传承“花儿”文化。

中国民协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从非遗保护的角度，以非遗保护的方法论阐述了作为西北地区地域标志性文化的“花儿”的价值以及保护方法，特别强调了非遗的活态传承，同时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治理方式，要重视“花儿”的社会价值，以推动社会发展。

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提出，要聚焦“花儿”系统传承、助力多民族共同富裕。他分析了合理利用“花儿”资源，促进多民族共同富裕的可行性和方法，建议挖掘“花儿”多民族共同生活基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多民族共同富裕。他同时提出了“花儿”系统传承的有效路径，一是尊重“花儿”基本内涵，弘扬当代价值；二是内部与外部融合，拓展“花儿”系统性传承；三是坚持整体立场，建设“花儿”动态传承机制。

兰州文理学院教授徐凤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产业的融合发展分为内部产业化和项目之间产业化两个途径，“花儿”作为传统音乐，具有间接性和潜在性特点，在研究、认识、利用方面应根据其文学性、音乐性、民俗性，与乡村旅游产业进行融合发展，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要突出“花儿”流传地地方文化特色；二是要重视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提供非遗保护、生态保护、产业化平台；三是要重视与“花儿”相关的非遗产品的网络传播与销售，保持良好的文化生态；四是以“花儿会”为契机，打造其他非遗生产性保护产业链；五是要重视“花儿”文创产品的开发与利用。

中国民协民间音乐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朱智忠指出，原生态

音乐与旅游业同生同长，原生态音乐是文旅产业最重要的文化标识，同时也是文化产业的金山银山。“花儿”是人类宝贵的生态歌种，在新媒体时代要重视原生态音乐“花儿”的传播与传承，探索“花儿”与产业的融合发展，建立“花儿”歌种的国际表达，在传播中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甘肃省非遗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高莉花介绍了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概况，阐述了“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思路和措施，提出建立并不断完善“花儿”保护区建设发展规划的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建设“花儿”文化传承点，对“花儿”文化进行整体性保护，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协调发展。

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许四辈从“花儿”言说、演唱的文化空间，阐述了“花儿”之于乡村振兴的有利因素。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花儿”文化元素的挖掘利用能助推农村产业发展、培育文明乡风、建设宜居生态环境、有效实现乡村治理。

甘肃省民协理事、甘肃省社科院副研究员戚晓萍指出，甘肃“花儿”文化资源丰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具备发展四级推进式文化赋能模式的条件。她对甘肃“花儿”流行区如何以“花儿”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以“花儿”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二是以乡村文化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花儿”是西北民间文化符号，也是甘肃省为数不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流行于甘、青、宁、新四省（区），传唱于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藏、裕固、蒙古等9个民族，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理应发挥其积极作用。本次论坛通过理论研讨，探讨了“花儿”文化助力西部乡村振兴的学理依据及合理的实践路径、方法。

参加论坛的除了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和活跃在当下“花儿”研究领域的中年学者外，还有不少卓有实力的新生力量。他们以新的视角来审视传统文化，给“花儿”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

6月15日，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二郎山花儿会”田野考察，实地调研了岷县“花

儿会”及“花儿”歌手的保护、传承现状。

（转自微信公众号“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 国际信息 ·

◆韩国校园迎来潍坊风筝工坊云课堂

5月17日，由首尔中国文化中心和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的潍坊风筝工坊云课堂，让来自韩国安平小学的100余名师生体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风筝制作课程。

课堂上，师生们首先观赏了潍坊市宣传片，并跟随风筝非遗传承人郭洪利在线游览了潍坊市风筝博物馆。郭洪利从风筝的历史起源、制作技巧、世界风筝作品等方面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并着重介绍了馆中收藏的韩国风筝，让同学们倍感亲切。随后，同学们在蒙面上挥动画笔，创作心仪的图案。在完成骨架粘贴、提线和放飞线绑定后，同学们纷纷制作出了各自专属的风筝作品，并表示要在课后试飞自己的风筝。参加活动的安平小学教师表示，在旅行不便的当下，能够亲自参与到这样内容丰富、体验感十足的中国非遗制作课程十分不易，此次活动不仅开阔了同学们的眼界、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多角度、深层次地推动了中韩文化交流。

（来源：首尔中国文化中心）

◆端午文化走进布达佩斯校园

2022年6月3日端午节当天，布达佩斯6区的埃克尔·费伦茨（Erkel Ferenc）小学全校200多名师生共同参与了“一起过端午——中国文化体验日”活动。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参与了“旱地龙舟赛”“画额”“绘蛋”“纸折粽子”“辨五毒”等端午特色游戏，同时还体验了中草药和书法等内容。

“一起过端午——中国文化体验日”是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与埃克尔·费伦茨小学共同举办的端午文化进校园活动。该活动将传统游戏与游园会相结合，让孩子们在体验节庆之乐的同时，帮助他们建立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憧憬。校长霍瓦特·帕洛西·卡塔

林表示：“我们很高兴与中国文化中心合作推出这样的体验活动，孩子们玩得都很高兴”。在端午进校园活动线下开展的同时，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还隆重推出线上展览“五月说端午”系列主题活动。该线上展以清代宫廷画师徐扬的《端阳故事图》为主线，兼取齐白石、任伯年等大师的画作，围绕端午时节的物候特点、时令美食与娱乐活动、中医药与养生保健三大主题，分篇章介绍了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及相关文化活动。同时，线上展还呈现了由中国日报社出品的以端午和中草药为主题的宣传片，以及由河南卫视制作的“端午奇妙游”系列视频，将节令的自然之美、绘画的艺术之美、节庆的生活乐趣与习俗中的人文关怀融为一体，为西方民众展示了一个健康、风雅又充满情趣的端午节。

（来源：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